

社会学家茶座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焱 | 总第四十四辑 2012年第3辑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迪 之
程新友
薛 涌
王晓渔
韩 君
郑也夫

审美趣味的变与不变——从蓝苹到江青
微博江湖的社会观察
为什么美国人素质低？（走出美国主义之六）
“民国范”或“党国范”
公民社会与市场法团主义
伦敦奥运断想（上）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2日

目录

卷首语 | FORWORDS

001 王 焱 桥与门

随 笔 | ESSAYS

004 刘 擎 民主社会中的教育权威

009 廖 奕 误入纽约的精灵

012 傅 铿 梦织成的悲哀

018 启 之 审美趣味的变与不变——从蓝苹到江青

024 阿 坚 我的“二”史

聚 焦 | PERSPECTIVE

微博与网络

032 沙柳坡 微博语境下的公民行动与民粹主义

039 程新友 微博江湖的社会观察

044 胡翌霖 话说网络时代的“版权”

050 宋丰田 网络时代的90后

社 会 | SOCIETY

055 韩 君 公民社会与市场法团主义

061 李向平 信仰重构：从革命党执政转变为执政党的重要机制

069 程俊阳 社会转型与利益表达机制

075 薛 涌 为什么美国人素质低？（走出美国主义之六）

080 郑也夫 伦敦奥运断想（上）

086 于爱群 同性婚姻：下一个浪潮？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091 潘天群 群体中的知识

097 燕海鸣 向历史索要价值——重温韦伯与新教伦理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

- 102 张天潘 当权力与知识开始媾和
107 王晓渔 “民国范”或“党国范”
111 阮 炜 东亚共同体：不可遗弃的愿景
115 罗白云 作为社会学家的格里尔逊

世 相 | MASSES

- 121 汤 军 性的社会控制
124 罗牧原、王冰洁 艺术的垄断

阅 读 | READING

- 129 吴万伟编译 简评《卢梭——不安分的天才》
133 张宗子 重读《水浒》

文 化 | CULTURE

- 140 高成鸢 虚岁、生日忌讳与家族生命观
145 方 刚 马来西亚性印象

资 讯 | INFORMATION

◇世界经济怎么了？◇从社会生物学看小团体主义◇2012，有关中国经济的三大疑问 ◇有关不平等的辩论◇谁摧毁了希腊？◇称谓的变化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执行主编助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马 洁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911
E-mail: majie0720@126.com
chazuo_shehui@hotmail.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1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第44辑/张立升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8
ISBN 978-7-209-06747-8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1541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16开本(172×232毫米) 10印张 160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00元

民主社会中的教育权威

刘 擎

君主制完全可以是一种好的政体，前提是要有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她）智慧超群又爱戴臣民，魅力非凡又宽容大量……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由他（她）来掌权治国，何尝不是万民之幸运？可是，哪里去找这样一位明君？若无神明佑助，希望太过渺茫，近乎痴人说梦。这大概是对君主制度最常见的、也非常有力的反驳。但人们往往会忽视，类似的诘难也可以用来针对民主制度。因为健全的民主需要品质优秀的公民：平等尊重他人，善于理性对话，在公共事务中能超越私己的利益与偏见，积极参与公共协商，必要的时候还能为公益而牺牲和奉献……这样优秀的公民又如何可得？似乎并不比期待一位英明君主更少幻想色彩。

在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中，国家（城邦）不只是有政体类型的区别，每一种类型还有“正宗”（正当）与“变态”（败坏）之别。现代国家大都倾向于建立民主制，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制比君主制天然优越，而是因为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与社会想象已经难以接受君主制度，人民主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正如托克维尔在 180 年前所洞察的那样：民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天意”使然。的确，现代政治的正当性不得不以民主为基础，这几乎无可逆转。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建设与实践没有危险和隐患。民主制度必须时刻对自身保持警觉，因为它可能堕落为一种败坏的形态——所谓“劣质民主”，而防止败坏的一种重要途径就是教育。于是，政治教育的重心也就从古代的“驯化君主”言说转变为现代的“公民教育”理论。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艾米·古特曼 (Amy Gutmann) 是一位公民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她是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28 年，并创建了著名的“人类价值研究中心”。2004 年开始出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第八任校长。她所著的《民主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 ,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艾米·古特曼教授北大发表演讲

1987/1999 年，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比大多数相关论著更有深度、也更具影响，被公认为是继杜威《民主与教育》（1916 年）之后对公民教育论题最为重要的贡献。这部著作试图为教育提供一个民主的理论，同时探讨“如何民主地开展教育”以及“如何以教育来促进民主”这两个主题。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教育包含社会化的所有影响。古特曼将教育的概念界定为“有意识的社会再生产”（14 页），民主的教育是公民“参与有意识地塑造民主社会的未来”的事业（15 页），这既不同于宽泛的“无意识的社会再生产”，同时又区别于狭义的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事业，教育暗含着对权威的要求，无论是确立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还是制定相关的法律与规则，都需要诉诸权威。那么“民主的”教育又从何谈起？如果将“民主”看做是与“权威”对立，那么“民主的教育”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但这是对民主的极大误解。民主政治并不反对权威，而是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确立正当的政治权威。同样，民主的教育也正是要以民主的方式来确立“谁有权威做出有关教育问题的决定”（11 页）。很显然，古特曼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理论，也必定触及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分歧的社会，审议式民主的卓越之处在于它愿意并能够应对分歧的风险与挑战。（而那种貌似果敢的政治“决断论”，企图在根本上消灭分歧以实现“同质化的民主”，实际上回避了最困难的挑战）在教育问题上，民主社会的成员也会出现争议。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国家的

公民应当总是被教育得能符合这个国家的构成”（19页），但如何确定一个特定社会的构成原则，以及符合这种原则的教育目标？这里仍然存在着重要分歧，因为西方社会继承了多种互相竞争的教育规范理论，根植于不同的政治想象。古特曼辨析了三种理论，分别称为“家庭国家（family state）”、“家庭构成的国家（the state of families）”以及“个人构成的国家（the state of individuals）”，各自蕴涵着关于教育权威的原则，潜藏在几种流行的关于教育的政治理解之中。她对这三种流行理论展开了富有洞见的批判考察。

第一，“家庭国家”理论主张国家垄断教育权威，可以以“家长制”为依据。但将国家视为所有公民的“政治”父母，至多只是一种隐喻。家庭国家更有力的理论是“柏拉图式的”——国家以知识和理性为基础确立了客观的正义原则，对公民实施完整彻底的教育，由此同时实现个人之善与社会之善。这是基于正确知识而形成的教育权威，致力于培养道德一体化的未来公民。但这个规划严重低估了父母对子女价值观的深刻塑造。即便真的有“哲学王”能发现客观的道德真理，国家要防止孩子受到成年人固有偏见的坏影响，就必须剥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利，这将要求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正如柏拉图自己意识到的那样，这是代价过高而不可行的规划。若要以说服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来改造成年人的观念，实际上就要求一个民主制度的背景条件。也就是说，以知识（真理）转变为权威的正当性条件是“家庭国家”的民主化。

第二，“家庭构成的国家”理论则主张将教育权威完全交给孩子的父母，由他们来决定孩子的培养和发展。这种理论诉诸成年人的自由权利，尊重父母将自己的生活理想传递给子女的自主性。同时，它也诉诸后果论的理由，因为（如洛克曾指出的那样）父母是孩子未来利益的最好保护者，将教育完全托付给父母会获得最好的效果。这种理论似乎能够回避关于教育的政治争论。但孩子不能仅仅被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未来公民”。家庭独占教育权威，有利于强化和固化各种特定的价值观和生活理想，但却不利于培育尊重、宽容与合作的精神品质。缺乏这些品质，民主社会的再生产将难以维系，甚至会危及家庭权威自主性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

第三，“个人构成的国家”理论主张，自由社会中的理想教育不应当诱

引导孩子偏爱任何一种有争议的良善生活，而是要致力于增强他们的选择机会和理性判断能力。因此，教师和职业教育家应当成为最高权威，他们最有可能实施“中立化”的教育：对各种生活方式“一视同仁”，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各种家庭的特殊理想，将未来公民的个人自由选择当做最高目标。但是，教师不可能回避任何实质性的美德而单纯培养理性批判能力，也没有任何教育能在所有生活方式中真正保持“价值中立”。实际上，公共教育不必在理性审议和美德教育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让孩子自由选择他们的良善生活，要么为他们灌输国家或家庭认定最好的生活。

在古特曼看来，将未来的公民（被教育者）看做专属于国家、家庭与个人的独占式的理念都是武断的，既不符合公民的人格构成，也没有把握政治生活的真实经验。但这三种理论都包含了部分真理：一个公民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国家和次级共同体（包括家庭）。由于这三重属性，任何单一教育权威的正当性都无法合理地得到辩护。因此，需要一个民主的教育理论。古特曼指出，民主国家所承诺的教育，既尊重各种家庭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也注重孩子的理性反思能力，使他们能理解和估价（不同于自身家庭传统的）其他生活方式的价值，同时又强调政治教育的价值，鼓励孩子偏爱那些与民主权利与责任兼容一致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的教育并不是中立的，它对不同的良善生活观念持有“厚此薄彼”的立场。这种“偏好”基于两个理由：首先是基于道德自由的价值，承认个人在自我反思中辨别生活方式的高低优劣并作出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偏向那些与平等尊重兼容的生活方式。其次是基于民主文化的价值，主张孩子的利益不仅是自由选择，还包括特定的公民美德，使他们能够认同和参与家庭之善和社会之善。这些特定的善的观念，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内在意义。“偏袒”这些美德不是基于客观的知识，而是（民主地）尊重公民对自身所属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方向的确认。由此，这种教育能够“支撑着民主的核心价值：以最具包容性形式出现的有意识的社会再生产”，使得社会成员“足以参与公民政治，足以（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优良的生活，足以分享到赋予公民生活以特性的次级共同体”。（45页）

古特曼承认，在民主的意义上，国家和家庭都具有教育的正当权威。但她强调指出，同样依据民主的原则，未来的公民应当被赋予权利和能力来批

判性地反思国家和家庭所倡导的各种良善生活。这就要求将一部分教育权威授予职业教育者，从而对国家与家庭的权威作出了限制。她特别提出两项限制性原则：“不压制”和“不歧视”。不压制是指禁止运用教育来限制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展开理性的审议与考量，这意味着提倡培养公民的“诚实、宗教宽容、互相尊重等品格”（47页）。而不歧视要求让所有可教的孩子获得教育，使他们不被排除在外而足以参与到塑造良善生活的政治过程中。这是对不压制原则的一个分配性的补充。这两个原则是基于民主的核心价值，对正当的民主权威作出的限制。

由此可见，古特曼的理论意在阻止任何单一群体垄断教育权威，主张在培养审议能力与美德教育之间达成平衡。民主教育承诺了两种同等重要、不可割裂的价值：一是“创造（或重新创造）紧密的共同体”，一是“促进人们的审议选择能力”。（49页）这样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再生产”，得以使分歧的人们能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之中，并共同分享公民的权利与责任，从而确保活跃与强劲的“审议式民主”——在她看来，这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民主理想。

误入纽约的精灵

廖 奕

在一个一无所有的美丽之乡，一群蓝色的魔力精灵快乐生活。他们的头领，长相酷似某位革命导师，身着红色，格外显眼，一把大胡子，象征资历、智慧和权威。他们住在蘑菇屋中，安居乐业，分工明确，没有根本矛盾，在嬉戏中驱除忧虑。他们本是单性的社群，可是有一天，一个花容月色的蓝妹妹不期而至，在这个平静和谐的王国投下了一轮爱欲的波澜。幸好，伟大的头领迅速用慈父的温情感化了这位本是巫师制造的“美女间谍”，使其成为坚贞不屈的蓝色家族核心成员。这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没有国家和政府，只有富足和安乐。

维系蓝精灵王国的，除了自足的经济基础、超凡的魅力领袖、坚定的情感纽带，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柱，那就是对外敌侵扰每时每刻的恐惧。没有敌人，就没有“我们”。区分敌我，是政治的首要工作，也是精灵们的生活要义。他们之所以要努力工作、服从首领、团结一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貌似无忧无虑的快乐王国时刻都处于危险的紧急状态。格格巫和阿兹猫的存在，如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魔鬼幽灵，提醒着精灵们安不忘危，时刻待命，准备逃窜。

巫师和猫居住在神秘的古堡，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捕获蓝精灵，榨取精灵液，实现魔力最大化。他们随时准备入侵蓝色王国，掳掠、摧毁那些可恨的魔法精灵。在巫师眼中，蓝精灵是他的魔法材料，绝不容许他们成为独立的魔法主体。事实上，蓝爸爸的魔法力量大有赶超之势，虽不及他，却因天

廖奕：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赋异禀潜力无穷，唯尽早除之而后快。巫师懂得现代科技，挥手之间便可造出自动一体化的精灵液榨取机。他是现代世界的隐士和另类，处于原始魔法王国与工商世俗社会的交界点上。格格巫和阿兹猫是典型的主奴关系。每当危险关头，格格巫总是用阿兹猫去试验和探路；每当格格巫触了霉头，阿兹猫总会笑着发出怪异的喵叫。

直到一天，莽撞的笨笨引来可怕的敌人，精灵们在遁逃中通过神奇的蓝色旋涡，误入纽约——一段新的神奇故事开始了。在这个巨大蘑菇林立，“移动房子”（精灵眼中的汽车）蜂拥，各色巨人如织的村子，蓝爸爸和他的孩子们震撼了。这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还来不及欣赏，他们便要逃离，因为格格巫在追杀。精灵们的逃离之路便是回家之旅。为了回家，他们必须找到望星镜和咒语书，必须等到五星连线和蓝月亮出现。他们必须积极找寻并消极等待。机缘巧合，他们寄居在一位善良的广告创意师家中，与这个家庭的成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最后合力战胜了邪恶的巫师。

回家成了难舍的离别。爱秀的勇勇亮出可爱的屁股，卡瓦伊的底裤赫然印着：I Love NY（我爱纽约）。在纽约的短短数日，精灵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笨笨从站立不稳、没有自信的小可怜变成了机敏果敢、关键一击的超级猛男。皱着眉头、从不开颜的厌厌变得情话滔滔、欲念疯长。爱美的蓝妹妹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多漂亮的新裙子，欣喜不已。智慧的聪聪学会了精灵的咒语，懂得了未知领域的深奥与广大。就连一贯严肃骄傲的蓝爸爸，在离别之际也动情地说：“你们这个村子，对我们很有启发。”可以预想，这些精灵回家之后，必会产生许多新的思维和举措，蘑菇村的旧样子必会出现许多新的冲击和变化。

这个故事可以用老套的历史观解释。代表先进工商业文明的纽约村感化了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蓝精灵，蘑菇村的未来很可能就是纽约化。如此思考的同时，别忘了，精灵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家。尽管他们很是不舍，但家的魔力是无穷的。他们是资本王国的短期寄居者，甚至根本就是路人和过客。他们进入纽约，不过是躲避灾难的一次误入。虽然联手现代人打败了魔法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资本王国的认同。当精灵们被中产阶级的小孩当做新式玩具在商场里追赶，被傻帽的超市雇员在机器上强刷条形码，他们

意识到，这是一个商品的物化世界，这里没有真挚的感情，只有永远的利益。这里的多数人和巫师一样，会觊觎他们的精灵液，所以并不安全。

资本的丑恶力量并未在这个故事中充分显现。那个试图与格格巫合作的女商人，对精灵的魔力梦寐以求，如果她知道了蓝精灵的秘密，又该如何？如果她发现了通往精灵王国的通道，定会比格格巫更为疯狂地剿杀这群无辜的生灵，以发明和利润的名义榨干他们最后一丝血肉和毛发。

蓝精灵的故事是转型国家及其未来走向的一个隐喻。曾几何时，古老的文明国家一切皆有礼制，尊卑序定，颜色类同，性情自由，尊奉权威。这样的黄金时代或虚无缥缈的三皇五帝，或存于现实的家族社群。强大的外敌一旦出现，情感的共同体缺乏对抗的暴力，唯有逃离，从形式上分崩离析。情感和信仰的纽带没有被折断，暂时的颠沛流离却成为重建家园的强大助力。在肉体逃亡的过程中，精神的凝聚更为紧密，甚至还可包容、创造新的主体和力量。误入异域文明的后果，是见识的增长、性情的转移和方略的变革，当然，必定也包含纠纷的滋扰、异议的对抗与秩序的威胁。各种主义与问题的搏斗，导出的不是混杂，就是均衡。

但是，蓝精灵们基于亲情的家庭原教旨，真的可以成为超越东方与西方、原始与现代、人类与精灵的普世价值吗？相对于个人至上、利益至上、功利至上的资本逻辑，团体合作、权威引领、亲情凝聚的社群主义真的更加符合人性的要求吗？蓝精灵的社会合作体制真的比主奴体制、资本机制更有生命力吗？处于十字路口的转型国家，究竟是应当面向那个光彩照人的纽约，还是单调大同的小村？抑或魔力至上的古堡？

蓝精灵故事的续集，不妨提前构思：万恶的格格巫出卖其魔法专利，与利令智昏的女商人沆瀣一气，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找到并试图摧毁蘑菇村。蓝精灵的世界因为纽约村的影响，已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也利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抵御和抗争。最终的结果是，蓝精灵变成了格格巫，格格巫变成了蓝精灵，而那些被资本操控的人则成了只会怪异喵叫的阿兹猫。



梦织成的悲哀

傅 铨

在一部 2003 年名为《西尔维娅》的英国影片中，曾获 1998 年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的格温妮丝·帕特罗出演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近来出演 007 的英国男演员丹尼尔·克雷格则扮演普拉斯的丈夫和诗人爱德华·休斯。影片由女导演克里斯汀·杰夫斯执导。电影开始时的镜头是英国剑桥的小巷，字幕显示的时间是 1956 年。当时西尔维娅还在剑桥的纽翰姆学院读书，诗作已经常在学生报刊 *Varsity* 上发表。不久西尔维娅便结识了在同一报刊上发表诗作的诗人休斯。休斯不仅是诗人，而且长得一表人才，还在学生中享有“花花公子”的美名。

两人坠入爱河不久便结了婚。在休斯得了“奥登奖”之后，他们回到了西尔维娅的美国故乡波士顿教书。西尔维娅的母亲初次见到休斯之时，似乎心里就为女儿感到了一种不安。女儿在波士顿斯密斯学院读大学时便患上了忧郁症，曾经吃下了大量的安眠药自寻短见，幸好及时得到抢救。休斯在学校教书很受学生的欢迎，在一次诗歌讲解会上，他朗诵了叶芝的这首短诗：

爱情的悲哀

叶芝

一群叽喳的麻雀在屋檐下闹喧，/ 一轮澄明的月亮在银河中高悬，/
所有树叶的那种万分的和谐，/ 仅仅是掩盖了人的形象和哭喊。

一位挂着哀悼红唇的女孩忽然出现，/ 眼泪中仿佛充满了世界的壮观，/
/ 犹如俄迪修斯和他劳苦的航船 / 注定沉落，像特洛伊王室视死如归；

在那吵闹的屋檐之下，冉冉 / 升起一轮明月在空旷的长天， / 那些树叶的所有哀怨苦叹， / 只能是凝固了人的形象和哭喊。（傅铿译）

这首诗仿佛成了两人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影片中，西尔维娅时时都提防着丈夫会有外遇，常常是无中生起醋意。有一次，丈夫的一位女学生把诗作拿到老师的家里来请教，西尔维娅的红嘴唇连同她鲜花般的脸蛋一下就变成了土灰色。影片常常用这种色彩上的对比来显示女主人的心情。加上到波士顿不久西尔维娅就生下了一个女儿，西尔维娅的创作毫无起色，反而不如她的学生时代。不久西尔维娅说服了丈夫，他们重新回到了伦敦的郊区居住从事创作。这时电影的银幕上显示的时间是 1960 年。

回到英国之后，西尔维娅的创作有了起色，先是出版了诗集《巨人》，赢得了文艺界的好评，也奠定了她在诗坛的地位；不久西尔维娅还写了一部自传体的小说《钟罐》（*Bell Jar*），主要讲述了她学生时代的经历。与此同时，西尔维娅又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好景不长，在搬到伦敦郊区后，西尔维娅对于丈夫的“花心”仍然怀着一种几乎是神经质的焦虑不安，常常会跟踪丈夫的行踪，难免引来无谓的争吵。有一次，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一对年轻夫妇，自己则搬到另一个地方居住。当房客得知西尔维娅是著名诗人时，都显示了敬仰之情。西尔维娅有一次请他们到自己的新居来做客，然而就在做客期间，她的第六感觉就让她感到丈夫已经被年轻而妩媚的女房客“花迷心窍”了，于是当场就发作起来，弄得四个人都相当的难堪。

然而更糟的是，“花迷心窍”的丈夫却义无反顾，真的与女房客阿莱莎开始了一场仿佛是神灵安排的悲剧性恋情。此时大约是 1962 年 9 月。西尔维娅的内心翻江倒海，乌云密布，一次她开车带着两个小孩来到了海边，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下风浪汹涌的无边大海，心泪如雨，但她还是默默地把车开回了家。此后的几个月里，她进入了最为旺盛的创作时期，写下了众多挖掘自己内心的诗篇。在极度的忧郁之中，她和一位编辑朋友谈到过死亡，编辑告诉她“死亡是一个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没有的无底黑洞”。她也做了一次与丈夫和解的尝试，再次把自己打扮得如花般鲜艳，再次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丈夫。当她要丈夫离开那个女人时，丈夫则回答说：“我不能，因为她已经怀孕了。”几天之后，在一个伦敦历史上最冷的冬天里，西尔维娅在厨

房里用煤气结束了她刚过 30 岁的花样年华，时间是 1963 年 2 月 11 日，凌晨 4 时。

在最后的镜头里，西尔维娅的遗体从公寓抬出来时，深红色棺木映衬在白茫茫的一片大雪地背景上，镜头高高地自上而下俯视，仿佛是给人一个暗示：悲剧不过是神灵安排的一场宿命。叶芝那首诗里的景象再度出现，树叶随着麻雀的叫声散落一地。电影没有交代的是，阿莱莎为休斯生下一个孩子四年之后，也带着孩子一起自尽了；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西尔维娅和休斯的儿子也在 2009 年自寻短见。西尔维娅的遗作后来由休斯编辑成诗集《埃里厄尔精灵》（埃里厄尔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精灵）出版。1982 年，《西尔维娅诗集》居然在诗人辞世后获得了美国“普利策”文学奖。

《西尔维娅》可以说是一部心理影片，它所注重刻画的是女主人的内心世界。影片仿佛想找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西尔维娅的一生仿佛是由缥缈的梦想编织而成的一个悲剧。在西方世界，自杀的诗人绝不在少数，比较著名的诗人就有马雅可夫斯基（1893 ~ 1930），莎拉·蒂斯代尔（Tasdale, 1884 ~ 1933），安妮·塞克斯顿（Sexton, 1928 ~ 1974，普拉斯的诗友），兰德尔·贾雷尔（Jarrell, 1914 ~ 1965，玛丽·麦卡锡丈夫），以及保尔·策兰（Celan, 1920 ~ 1970）。2001 年，一位叫詹姆斯·考夫曼的心理学家创用了“西尔维娅·普拉斯效应”一词，用来描述诗人比其他任何创造性作家都更容易受到“心理忧郁症”危害的现象。考夫曼进一步指出，女诗人要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容易染上忧郁症，而且女诗人也比女艺术家、女演员或女政治家更可能患心理疾病。这一效应已经为其他的心理学研究所印证，2004 年 4 月 24 日的《纽约时报》以“过早进入的晚安”（Going early into that good night）为题，专门讨论了这一现象。

既然有那么多的西方现代诗人都自寻短见，我难免要问：究竟是原本气质忧郁的人善于写诗，还是写现代自由诗的人容易染上忧郁气质？写中国旧体诗的诗人，虽然用了大量的“愁”字，但很少有中国旧体诗人自寻短见。西方的自由诗篇虽然浪漫迷人，尝试超越尘世和世俗规范的约束，但一味沉溺其中，就像沉溺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恋性白日梦一样，极易造成精神疾病。开句玩笑说，这也是我一直不喜欢用中文一味模仿各种西方自由诗的原

因之一吧。

人们说的精神病人常常拥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天赋的现象无疑已被很多事例所证实（荷尔德林最为明显），然而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只出现于西方文化，这种病态的天赋很少在中国文化里开花结果。也许中国人还是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走极端，也更加不能容忍走极端的人。我想说的基本想法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讲不逾矩，还有讲入世，所以无论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如何反传统，世俗的舆论和习俗仍然有一种压抑怪癖的天才的倾向，中国恐怕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西方自现代派文学诞生以来（从波德莱尔开始）那样对世俗的全面反叛，因为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都经受不住这样的反叛。其次，福柯的作品是带着强烈政治色彩的哲学思想，不能将其当做科学事实的陈述。而且，法国在18世纪前只是把精神病人关在监狱里，当做是社会离轨之人，并不是说精神病人不存在。福柯想说的是，对于“病人”或“犯人”的界定，取决于当时占主导的“话语”。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于“行为和思想离轨者”无疑已有更大的容忍姿态，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西方那样包容各种各样的“怪异”之人，打压思想异常者就更加不用说了。不过这里说的主要是一种社会风气：总而言之，中国的社会风气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常常拥有不同寻常的天赋”。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化缺乏原创性的原因之一。

另外，美籍意大利诗人庞德由于在二战期间支持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在1945年被盟军抓住后以叛国罪起诉，在严酷的监狱里，精神出现了崩溃，最终被判定不适合接受审判，但后来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被关了12年。不管是不是真疯，庞德的文思确实是极其怪异。不过绝大多数的一流文艺创作者心智都是正常的，只是很多西方诗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相当的不同寻常，如爱伦波，迪伦·托马斯和奥登的那种疯狂的酗酒，都过早地夺去了他们的创作生命。

下面由笔者翻译的西尔维娅的这首十四行诗是她在剑桥学生时代的早期作品，从来没有收集在她的任何诗集里，是近年来被黑鸟文库发现后而引起广泛兴趣的一首诗。西尔维娅的诗体被称为忏悔诗体，因为她的诗注重挖掘诗人的内心世界，就像这首描述“厌烦”的精致之作。原诗不仅严格遵守了皮得拉克体十四行诗的体例和韵脚，而且引用了西方文学作品中众多的典故

和暗喻，如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菲茨杰拉德的《温柔之夜》，亨利·詹姆斯的《从林中的野兽》，弗兰克·斯托克顿（Stockton）的《女士还是老虎？》，以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厌烦”（Ennui）原是法文词，波德莱尔在《恶之花》的开首诗篇“告读者”中称“厌烦”是一个“精致的妖怪”：“它名叫‘厌烦’！——眼中带着漠然之泪 / 它吸着水烟筒，梦想着断头台 / 读者，你可认识这个爱挑剔的妖怪。”

厌 烦

茶叶制止了那些幸灾乐祸之辈， / 设想出种种无事发生的未来， / 吉卜赛人翻弄手掌，打着哈欠 / 仍在预言将来不会再有危险。 / 危难已经微不足道：天真的骑士 / 发现怪兽早已过时，恶龙匪夷所思 / 而见多识广的公主们指控道， / 与恐怖作战只是无比的荒谬。 / 詹姆斯丛林中的野兽不会再乱跳， / 使得英雄百无聊赖，壮志难酬； / 无所用心的天使成了神的宠儿， / 竞技场上的无聊大众一度显出兴奋， / 希望看到大灾难，无论祈求或奖品， / 都无法骗弄末日之门的女士和老虎。

附原诗：

Ennui

Sylvia Plath

Tea leaves thwart those who court catastrophe,
designing futures where nothing will occur:
cross the gypsy' s palm and yawning she
will still predict no perils left to conquer.
Jeopardy is jejune now: naïve knight
finds ogres out ~ of ~ date and dragons unheard
of, while blasé princesses indict
tilts at terror as downright absurd.
The beast in Jamesian grove will never jump,
compelling hero' s dull career to crisis;
and when insouciant angels play God' s trump,